第48卷 第5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48, No. 5
2011年9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ep. 201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启蒙

方祖猷
(浙江大学 韩国研究所, 杭州 310058)

摘 要: 1897年,孙中山先生赠日本友人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摘录本《原君原臣》小册子,孙中山在以杞忧公子之名发表的《序》里指出:人民设立君臣都要"为民役";黄宗羲这一"超越千古"的"高瞻远识",可以"启迪后生小子之蒙",表示对自己当时的民主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孙中山将黄宗羲的君民之间主客关系,发展为主仆关系,此后他一再强调国家官吏都是人民"公仆",这成为他的民权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写于西方近代民主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之前,说明民主思想在中国并非舶来品,它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黄宗羲; 孙中山; 原君原臣; 民主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1)05-0111-06

黄宗羲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其民主思想主要体现在《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和《学校》诸篇上。他的思想对清末维新和革命两派都有影响。本文就《原君》、《原臣》两篇对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启蒙进行分析,求教于方家。

一

自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按:指《明夷待访录》)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①,"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②,此后,人们多认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这本名著,仅对清末维新派产生了影响。其实该书在这之前对清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也同样起到了民主"启蒙"作用。

光绪二十一年(1895)立夏,孙中山先生节录《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印刷成小册子,以杞忧公子之名,写了一篇《原君原臣序》,刊于卷首。这本书现保存于日本和歌山南方熊楠纪念馆。该《序》全文如下:

> 从来天生民而立之君长,所以为民役者也,君一人不能独治万几,于是建设臣工以分治之,凡佐君为民役者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千古之通义,先觉言之。后世讳之,皆未知君臣之义,悉为治民而生。苟大地子子无生民,又何从有君,又何从有臣工哉?惟不知立君之为民,故一人晏安,百姓失所;惟不知立臣之亦为民,故百僚阿顺,损下益上,呜乎!此其敝人人心非之,而人人不能深知之、明言之。陵夷以至于今天,心之所深恫也。
>
> 惟有明黄梨洲先生,家传忠孝,卓荦能文章,高瞻远识,超越千古。尝著《明夷待访录》一编,附托于箕子之箕难艰贞。内有《原君》、《原臣》二论,尤足握全书之要,垂万世之谟。爰摘录印行,希以启迪后生小子之蒙,而张中国自强之本。孔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窃遵斯旨,以告夫当世之有心富强者。乙未立夏,杞忧公子小引。

乙未立夏,即1895年阳历5月6日。是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的一年,也

收稿日期:2011-06-17
作者简介:方祖猷,男,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① 梁启超:《中国学术概论》六《黄宗羲和王夫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黄梨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7页。

是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后的一年。

这里,可能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说《原君原臣》这本小册子不是梁启超、谭嗣同辈所私印"节钞数万本"秘密散发中之一本,而为孙中山所得持以赠人的呢?对此可以否定的理由有二:

(一)据《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卷二《谭嗣同传》,正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那一年,康有为在京师设强学会,谭嗣同慕名往谒,适康有为不在,未遇,由强学会的记纂梁启超接见,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间在此年7月。而《原君原臣》书中杞忧公子所写的《序》,明言在此年立夏5月。其时谭嗣同尚未认识梁启超,当然不可能两人节钞《明夷待访录》印数万本散发。

(二)梁启超于是年具名于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书》中口口声声说"我皇上深仁厚泽"、"皇上英明天亶"等等,与他所说私印《明夷待访录》节录本"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从政治观点来说,相距甚远。与《原君原臣序》立君"为民役"、设臣"佐君为民役"的观点,相距更远,所以杞忧公子决非维新派人士。

其实,这本小册子是革命派所印,而杞忧公子即孙中山。理由有四:

1. 确有证据证明,革命派早期印行过《原君原臣》一书。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自序》说:1894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创立兴中会,"时兴中会之宣传品仅二种:一为《扬州十日记》,……二为黄梨洲《明夷待访录》选本之《原君》、《原臣》篇,均由余店代为印刷"。① 所谓"余店",即冯自由父在日本横滨所开的文经商店。可知这本《原君原臣》小册子,由革命派印于日本横滨。

2. 兴中会成立初期,极其缺乏写作人才。当时与孙中山志趣相投、关系密切的友人,多受过西方的教育,然而深谙国语者基本无人。如邓荫南和"四大寇"中的尤烈、陈少白、杨鹤龄以及陆皓东等,有的以经商为生,有的是会党首领。只有陈少白善于词章,然政论非其所长。故冯自由说:"兴中会初期,文人墨士极感缺乏,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②孙中山1882年自檀香山教会学校毕业回国后,自感国学浅薄,相继拜区凤墀和陈仲尧为汉文教师,国学水平大有提高,除能阅读中医书外,又学习孔、孟之书。1893年他在广州《中西日报》刊登行医广告,开始即说:"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统中西而探奥旨。"③故能在1894年写《上李鸿章书》,洋洋万余言,据说该《书》他曾"就正于太平天国状元(?)王韬,王为易数语而已。"④所以环顾当时这些少数革命志士,只有孙中山有可能引用孟子原文来作序。

3. 孙中山写这篇序言的第二年即1896年,他因广州起义失败被通缉,曾由美赴伦敦,被诱捕关于伦敦使馆内,在其身上搜出了《上李鸿章书》与这本《原君原臣》小册子。经营救脱险后,他客居伦敦。次年,在大英博物馆认识了日本学者南方熊楠,成为好友。孙中山因而赠与从清廷使馆中归还的《原君原臣》一书,亲自在封面上写:"南方先生鉴,孙文持赠"九字,这本书现藏于日本和歌山南方熊楠纪念馆中。若这篇《原君原臣序》非孙中山著,他是不可能将他人所写序言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节录本签上自己名字赠人的。

4. 更重要的是,他在伦敦蒙难时,清金山总领事冯咏蘅向清廷禀报:"查该犯书册两本,一系摘录《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称杞忧公子;一系上李傅相书,自称'文'"。⑤ 据孙中山《伦敦蒙难记》自称,他遭拘后,被监守者搜身,抄去"仅无重大关系之文件数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革命初期之宣传品》,第10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孙总理行医广告》,第7页。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孙总理之文学》,第14页。

⑤ 《罗家伦先生文存》第3册,《中山先生伦敦蒙难记史料考订》,台湾:台北国史馆1976年版。冯咏蘅的禀报,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教授见赐,附此感谢。

纸而已"①,这当指冯咏蘅所说这两本书。清廷使馆人员又多次对他审讯,断定他"自称杞忧公子",即孙中山承认他自己就是为《原君原臣》作序的杞忧公子。

经过上述考论可确证,杞忧公子即孙中山的化名。

二

孙中山先生在这篇序里,对黄宗羲推崇备至,说他"高瞻远识,超越千古",指出《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论,"尤足据全书之要,垂万世之谟",故摘录印行,希望能"启建后生小子之蒙"。所谓"后生小子",自然包括他自己在内。他坦承:《原君》、《原臣》中高瞻远识的精神,永垂万世,对自己当时的民主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那么,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这二篇在哪些方面启孙中山民主思想之蒙呢?我们可以对比《原君》、《原臣》二篇与孙中山先生此书的序言内容,分析如下:

(一)黄宗羲在《原君》开篇即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②这段话实际上在讲国家的起源。孙中山在《序》文一开始即对黄宗羲此句简要归纳为:"从来天生民而立之君长,所以为民役者也。"表示自然界生民设立君主,是为天下万民兴公利除公害服务,而非为君主一己之私。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他认同黄宗羲上述观点。

黄宗羲又将上述上古三代之君其"毕世而经营"的事业是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观点,概括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命题。接着他批评今日之君:"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孙中山同样抨击今天的君主:"惟不知立君之为民,故一人晏安,百姓失所。""无地而得安宁",即"百姓失所"。黄宗羲和孙中山师徒俩人,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祸害和以民为主的精神上,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二)黄宗羲在《原臣》篇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③孙中山同样在《序》中说:"君一人不能独治万几,于是建设臣工以分治之,凡佐君为民役者也。"黄宗羲又认为:"世之为臣者昧于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因此不顾"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为感君上知遇之恩,自甘于"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孙中山据此指出:"惟不知立臣之亦为民,故百僚阿顺,损下益上。""百僚阿顺",即自甘"跻之仆妾之间";"损下益上",即不顾"民生之憔悴"。

黄宗羲严厉地批判君臣之义不建立在为天下万民谋利的基础上,从而造成民怨沸腾的现象,他在《原君》中说:"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视之如寇仇",《孟子·离娄章句下》原文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原句称"一夫",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至废孟子而不立",指明太祖朱元璋见上述《孟子·离娄章句下》这句话,认为非臣子所应该讲的,将孟子牌位从孔庙配享中撤出,见《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孙中山在《序》中也谈到君臣之义,也引用孟子的话,他说:"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千古之通义,先觉言之。后世讳之,皆未知君臣之义,悉为治民而生。"所指"后世讳之"的"后世",即黄宗羲说的"小儒";所指"治民而生",即君臣都应"为民役"。孙中山所引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与黄宗羲所引用出自不同的篇文,但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在精神上一致。

由此可明显看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

① 《孙逸仙伦敦蒙难记》,《中山全书》第4册,新文化书社1928年版,第10页。
② 《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 《明夷待访录·原臣》,《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页。

《原君》、《原臣》两篇,启孙中山民主之蒙。但孙中山并不是简单地接受黄宗羲的观点,而是既有所接受,也有所发展。

据孙中山《年谱》,他的革命运动始于光绪十八年(1892)①,至光绪二十年(1894),他有《上李鸿章书》,提出富国强民的远略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②,而没有提到,也不可能向李鸿章提到推翻满清和改革君主专制的主张。在他上书李鸿章被拒后,即创立兴中会于檀香山。这一年春,他在香港设兴中会总机关,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筹划广州起义。可是是年立夏,孙中山写《原君原臣序》,在这篇《序》里尚保留了"君"的位置,他引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对君主制批判的口气尚比较缓和。而黄宗羲在《原君》篇里直斥专制君主为"寇仇",为"独夫",其遣词用语之激烈,甚于孙中山,说明当时孙中山虽接受了黄宗羲的观点,然当时考虑的重点在"驱逐鞑虏"的种族主义,而较少"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权主义。

不过,孙中山在这篇《序》里,对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观点,作出了重要的发展。《原君》所说:"天下为主,君为客",意谓民是主要的,君是次要的,属主客关系。而孙中山强调的君民关系,表面上引用《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的话,所表达的意思是立君"为民役",设臣"佐君为民役",即民为主人,君与臣都是民所役使的仆人,属主仆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学生孙中山的民主意识超过了他的启蒙老师黄宗羲。

三

自此之后,孙中山彻底抛弃了君主制度,明确提出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这两篇"握全书之要,垂万世之谟"的精神,仍在他各项活动和论述中有或明或暗的流露。1905 年,同盟会成立,提出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次年 12 月,他在《民报》创刊周年的庆祝会上演讲时说,"平等自由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③,第一次将他在《原君原臣序》上提出君臣都要"为民役"的观点,简要归纳为君臣都是"公仆"。以后,他不时宣传自己的这一观点。1912 年 3 月,他至内务部令:"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④1919 年,他撰《建国方略》,系统地提出自己的"孙文学说",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中说:"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⑤,民国时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⑥。乃至在他逝世前一年的 1924 年,他对《原君原臣序》里"为民役"的公仆概念,作了具体形象的解释,在演讲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时说:"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⑦,"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⑧。又说:

> 到了(人类)同天争的时代,专讲打(野兽)是不可能的,故当时人类感觉非常的困难,后来的有聪明的人出来替人民谋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树上做屋室,替人民谋避风雨的灾害。⑨

这段话显然受《原君》篇"有生之初,……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

① 《年谱》二十七岁条,《中山全书》第 1 册,第 4 页。
② 《书牍》一《上李鸿章书》,《中山全书》第 4 册,第 1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330 页。
④ 《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115 页。
⑤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中山全书》第 2 册,第 46 页。
⑥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中山全书》第 2 册,第 52 页。
⑦ 《民权主义》第 5 讲,《中山全书》第 1 册,第 81 页。
⑧ 《民权主义》第 5 讲,《中山全书》第 1 册,第 83 页。
⑨ 《民权主义》第 1 讲,《中山全书》第 1 册,第 6 页。

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影响,稍作变动而举例予以说明。孙中山受黄宗羲民主思想启蒙而发展之,在这篇他对民权主义的演说中,表达得十分清楚。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以"三代之盛"与"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相对比,将三代"古之人君"与三代以下"后之为人君"相对比,通过这一手法,对后之人君专制残民的祸害作激烈的抨击,而赞扬上古三代的尧、舜、禹。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时同样对三代尧、舜、禹、汤、文、武的君主赞不绝口。他说:"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实在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其余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①又说:"中国尧舜是很好的皇帝,他们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②其所谓"公天下",正是黄宗羲《原君》篇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也就是"天下为公";其所谓"家天下",也正是该篇黄宗羲所说"后之为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孙中山以秦始皇筑长城为例说:"而当时之筑长城者,只为保其一姓之私,子孙皇帝万世之业耳。"③也就是天下为私。

孙中山据此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了进一步的批判,他说:

> 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弄得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便发生民权的革命。④

这种"大觉悟",岂不与《原君》篇所指出的"是以其(君)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观点一脉相通的吗?黄宗羲所说"博我一人之产业",孙中山称之为"做他一个人的私产";黄宗羲所说"奉我一人之淫乐",孙中山称之为"供他一个人的快乐"。

不过在这里,师生之间出现了分歧,孙中山由于忙于革命,似乎没有看过《明夷待访录》中的《学校》篇,因为在这篇文中,黄宗羲提倡学校从行政建制中独立出来,以学校"公其是非"的舆论权和议政权来监督、制衡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但尚保存君主的地位。⑤ 正如侯外庐所说"宗羲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学校是"议会政治萌芽"。⑥ 所以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属君主立宪制形式的民主制,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张建立民国,革了君主政体的命,属总统制形式的民主制,不过这一分歧,无妨于黄宗羲对孙中山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

黄宗羲是我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他的诞生比最早提出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的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早22年,《明夷待访录》成稿比洛克《政府论》下篇的出版早27年。他的诞生又比提出现在流行的三权分立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79年,《明夷待访录》比其所著《论法的精神》(即《法意》)早85年。黄宗羲的诞生更比提出天赋人权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早102年,《明夷待访录》比其所著《社会契约论》早99年。在17、18世纪,中国与英法两国的启蒙思想家都在封建君

① 《民权主义》第5讲,《中山全书》第1册,第74页。
② 《民权主义》第5讲,《中山全书》第1册,第77页。
③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中山全书》第2册,第29页。
④ 《民权主义》第1讲,《中山全书》第1册,第7页。
⑤ 关于《学校》篇里学校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作用,见方祖猷:《黄宗羲长传》四《厕身儒林初期》3《条具为治大法的〈明夷待访录〉》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108页。
⑥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册,第三章《黄宗羲的思想》,第二节《黄宗羲的近代民主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4页。

主的淫威下,各自探索适合自家国情的反对君权神授、君主专制和代之而起的新的政治体制的道路。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说民主在中国是舶来品,这是认识上的误区。《明夷待访录》是在我国土壤上土生土长含有近代意义的民主学说的萌芽,而且比欧美还要早。它启蒙了中国近代的维新派,也启蒙了革命派。孙中山借鉴了它为他的建国方略之用,我们当也能借鉴它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之用。

The Enlightenment of Huang Zongxi's *Waiting for the Dawn* on Sun Yat-sen's Thought of Democracy

Fang Zuy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Korean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In 1897, Sun Yat-sen presented his Japanese friend a booklet entitled *Search for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Monarch and his Ministers* (*yuanjun yuanchen*) which was part of *Waiting for the Dawn* (*mingyi daifanglu*) written by Huang Zongxi. In the preface of the booklet published under the pen name of Jiyou Gongzi, Sun Yat-sen pointed out that the monarch and the ministers established by the people must "serve the people". As Huang Zongxi's "great foresight beyond history" could enlighten the people of later generations, Sun Yat-sen thought Huang's view played an important enlightening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his thought of democracy. Huang conside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monarch as one between the host and his guest. Sun Yat-sen developed this view and held that it w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ster and his servants. Then he once and again stressed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all servants of the people, which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thought about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Huang had his *Waiting for the Dawn* finished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works written by the modern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thinkers in the West. This showed that the thought of democracy was not imported from abroad. Huang's view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in the current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Huang Zongxi, Sun Yat-sen, *Search for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Monarch and the Ministers* (*yuanjun yuanchen*), democracy

(责任编辑 何 方)